

《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先刚 著)^①

程炜(柏林洪堡大学古典系与古代哲学研究院)

先刚是汉语学界第一位系统介绍图宾根学派对于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研究的学者。2004年,他就在《哲学门》发表了《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几个基本问题》,介绍柏拉图的本原学说。^②然而,当读者看到十年后他又推出汉语学界第一部从这一理念出发整体研究柏拉图的专著《柏拉图的本原学说》(以下简称《本原》),或许依然会感到惊讶。

本书的宗旨,如先刚“前言”中已经强调的,并不是忠实地转述或重述图宾根学派的柏拉图研究,而是试图跟随图宾根学派的理念,结合未成文学说与书写著作,系统并且独立地研究柏拉图哲学。另一方面,作者也希望本书能够起到“柏拉图导论”的效用,

① 《柏拉图的本原学说》(2014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感谢先刚慷慨地让我提前阅读本书手稿;陈冀帮我扫描了本书;赵雪峰、罗志达、展翼文、吴天岳、蒋如俊、林丽娟、詹文杰、陈玮诸君各方面的批评、建议、补充和修订。评论中的所有失误均由笔者负责。

② 参见先刚:《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几个基本问题》,《哲学门》,2004年,第5卷,第1-20页。

带领对相关领域尚不熟悉的读者完成一个对于柏拉图哲学的宏观认识。可以说,这两个充满张力的意图建构了本书的核心特征,它们要求作者在学术建构与知识普及之间寻求某一平衡。至于《本原》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完成了这一双面的任务,我将在下文详细讨论。^①

作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一种,《本原》除前言外,共有11章以及附录一篇,主题是关于图宾根学派的争论。本书同时附中英文双语目录,书后有参考文献^②,但遗憾的是缺少主题、人名和引用索引。如果三联出版社——如其所言——试图通过这套丛书在汉语学界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和“保证学术品质”,那么它最好能够按照学术出版的通例编辑基本的索引信息。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希腊文的编辑排印仍旧不令人满意,比如将 *sigma* (Σ) 与 *zeta* (Z) 混淆,而这类错误在作者打印稿中实际上并不存在。

关于本书的宏观结构,如作者所说,“前半部分(第1-5章)主要是一种以柏拉图哲学的‘形式’为对象的方法论讨论,而后半部分(第6-11章)则是就柏拉图哲学的‘内容’作出的提炼和分析”。抛开对于柏拉图生平的介绍(第1章),作者在本书的前半部分(第2-5章)试图从解释学上说明,为何柏拉图的研究必须将对话录和所谓的未成文学说结合起来。宏观上,作者的论证也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方面集中于书写的限度,另一方面集中于柏拉图写作的动机。就前者而言,《本原》一书主要诉诸于两个论证。首

① 在创作本书时,作者利用了部分自己已经发表的论文,但熟悉这些论文的读者可以发现,所有收入这一专著的内容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遗憾的是,作者没有按照通例提供一个具体的目录,以便将发表论文和这一专著的相关部分对应。

② 本书的英文目录和参考文献部分均有少量错误,比如 Konrad Gaiser 的 *Gesammelte Schriften* 出版地不是 Berlin,而是 Sankt Augustin。

先,作者从文化史的角度试图说明,在经典时期的希腊城邦,写书并非唯一的,更不必说统治性的学术活动的媒介。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依据柏拉图在《斐德若》和“书简七”中的书写批判,试图证明这一批判适用于所有的书写作品,因此对话录并不能避免书写的弱点。而在对于柏拉图书写动机的说明中,作者从“竞赛”(agon)的角度说明柏拉图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与诗人、智者与其他哲学家的竞争中,捍卫“道统”与争取传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尽管强调了书写批判的普世性,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对话录形式的意义。与之相反,作者认可了这一写作方式与口传的密切关系,但否认这一形式可以逃离柏拉图本人对于媒介的批判,也否认集中于对话形式本身足以参透柏拉图哲学的实质。本书的后半部分(第6-11章)讨论柏拉图哲学的内容。由于作者借助本原学说来重读对话录,又因为本原学说的主体构架是关于一与多的形而上学,所以并不奇怪,《本原》一书的后半部分也集中于柏拉图的理论哲学,而实践哲学留给了最后一章。并不与作者的划分完全一致^①,我们可以将这一部分划分为两大部分:第6-8章体现了一条上升之路,处理柏拉图哲学从理念学到本原学说的推进;而第9-11章则与之相对,展现了一条下降之路,即本原学说在经验领域的运用(分别为,本体论的运用:混合;方法的运用:辩证法;政治哲学的运用:国家与民众)。这里作者同样有一个双重的任务,即一方面展示对话录如何暗示或提示本原理论;另一方面则说明本原学说反过来如何帮助我们阅读对话录。

除了借用图宾根学派结合间接与直接文献的研究方法之外,本书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特征。其一是方法论上的,在前言中,作者直言不讳地承认,本书对于柏拉图的解释的出发点之一在于对

^① 作者将第7-8章称之为“走向本原的道路”,而第9章为“从本原出发的道路”。

柏拉图学说的尽力认同。这一断言并不仅仅意味着作者的首要目标是理解,而非批判柏拉图的学说;而且从后文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显然试图将对于柏拉图学说(*dogma*)的捍卫转化为对于当代教条(*dogma*)的批判。于是并不奇怪,本书间或——尤其在最后一章对于柏拉图政治哲学的阐发中——将学理解释与尼采式的文化批判相互结合。其二,本书尤其重视德国古典哲学与柏拉图本原学说的相互阐发,作者倾向于认为二者之间具有精神与学理的高度一致性。由于作者主要用力于谢林,在某种意义上补充了图宾根学派的代表学者哈弗瓦森(J. Halfwassen)对黑格尔与柏拉图关联的阐发。从上述两个特点也可以看出,正如作者所强调的(见“前言”),本书尽管秉承了图宾根学派的诸多理念,却不应该被视为对于图宾根学派的忠实复述,而毋宁说作者从这一学派的解释学框架出发达成的独立成果。

依照《本原》一书的结构,笔者的评论结构如下:首先(本文第2节),我将主要评论本书对于柏拉图生平和著作基本状况的介绍;第3节则集中于本书的柏拉图解释学和方法论;第4节则考察具体的对话录解读;第5节,笔者试图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补充先刚对于谢林与柏拉图本原哲学关联的考察。第6节则是对全书的总括性小结。而本文的论述将主要包含三个面向:(1)总结《本原》一书的基本方法与内容;(2)批评本书中的部分立场与论证;(3)评论本书间接引发的一些议题。与(2)不同,在(3)中,我并不与先刚的论题进行直接的交锋,而是试图补充、发展或者提示由《本原》一书间接引发的一些值得关注或讨论的议题。相比于称颂作者的某些洞察,笔者更愿意批判性地审视全书的具体论述;而相比于提供相反的论证,笔者更关心也更愿意展示相关事态本身的复杂性,以便为未来的讨论开辟一些可能的空间。

二

同作者的谢林专著一致,《本原》一书以柏拉图的生平和著作开端。在对于柏拉图生平的论述中,作者并没有提供一个批判性的历史叙述,而更多地以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传记为基础,描画了一个在轶闻传统中的柏拉图形象。除了这一来源,作者另一主要倚重的材料则是归于柏拉图名下的书信,特别是书简二、书简五和著名的书简七。与多数柏拉图传记类似,作者将叙述的重点放在了柏拉图在西西里的政治实践上^①,特别是这一实践与其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作者也没有忘记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弟子的特别身份,尤其注重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其他弟子之间的互动和竞争。^②

作者在书尾批评了来自阿里斯托克塞努斯(Aristoxenus)的柏拉图传说,认为其中反映了学园派与漫步派之间的斗争,并且也提及,之前的论述包含“各种记载和传说”;甚至在第8章,作者也明确注意到古代传记材料并非完全可信。但在全书的多数行文中,作者似乎对各种古代传记,尤其对来自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材料缺乏足够的批判性考察。而相比于对晚期传记材料的使用,可能更让人疑虑的是作者对于书简二^③和书简五的使用。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书简往往被学者视为伪书^④,而且更为微妙的是,在书简二中所展示的书写批判的内涵与《斐德若》和书简七所

① 关于柏拉图与西西里这一问题,参见 von Fritz(1968)。

②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 Kahn(1996)。

③ 书信二在本书第2章再次被引用。

④ 关于“书信二”和“书信五”,多数学者的意见为伪(关于书信真伪的学界意见,参见 Guthrie(1978),p.401。

记叙的并非完全一致。埃尔勒(Erler 2007:311)认为这一文本的书写批判是毕达哥拉斯式的,而斯勒扎克(Szlezák)在《柏拉图与哲学的书写性》的附录部分认为,书简二的作者误读了柏拉图的书写批判(参 Szlezák 1985:386)。换句话说,鉴于先刚在本书中是认同斯勒扎克对于书写批判的解读,那么引用书简二实际会威胁到自己的论证。书简二甚至提到柏拉图希望自己的哲学在叙拉古得到普及(311e-f),这一精神与先刚所强调的柏拉图的精英主义也略有偏差。

即使不考虑作者后文中的理论陈述,仅仅集中于《本原》一书的柏拉图生平概述,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柏拉图的偏爱。但这一偏好却可能影响了本书历史叙述的可靠性,因为作者往往直接接受了柏拉图制造的苏格拉底与智者(或许包括学园与伊索克拉底)的对立,甚至间或提供了比柏拉图的叙述更为强化的版本^①。于是,我们可能会疑虑本书柏拉图主义的历史叙述与实际历史之间的张力。例如当作者比较伊索克拉底与柏拉图的学园时,称前者仅仅“为了迎合‘市场需要’,完全以盈利为目的”,而后者“只是仿效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朋友团体,目标是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研究学问,同时传授知识”。这一判断或许一方面简化了伊索克拉底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philosophia*)理念^②,另

① 对于智者历史叙述的类似问题也出现在第5章,比如作者提到:“对于古希腊的职业智者来说,口传才是王道,但写作也是一项必要的副业”(第5章)。这一断言一方面似乎削弱了柏拉图书写批判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则忽视了书写与口传的冲突在智者传统中也是有争议的论题。因为虽然早期智者并没有明确论及他们对于口传和书写的态度,但柏拉图的《斐德若》的书写批判,也是在与后来的修辞家阿基达马(Alcidas)与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论争中展开的。如果我们将后两者作为智者传统的某种继续,他们却对于书写和口传持有完全相反的立场:阿基达马偏好口传,伊索克拉底则倚重书写,参 Erler (1987), pp. 38-59。

② 关于伊索克拉底的哲学概念,以及他和同代人之间的关联,参 Eucken (1983); Usener (1994); Wilms (1995)。

一方面则有稀释毕达哥拉斯派的宗教面相的嫌疑。

在对柏拉图著作的介绍中,作者简略介绍了对话录的流传、版本(尤其是德语学界的译注)、真伪问题、编年和分类。无疑这些内容是服务于柏拉图导论的目的,但另一方面,这一部分内容显然已经试图为后文中的柏拉图解释学进行铺垫,这尤其体现在作者最后对于柏拉图不同研究路径的介绍中。作者并没有列举所有的柏拉图读法,而是主要讨论了被他称为“整体规划说”、“思想发展说”和“机缘说”的三种研究进路。粗略来看,第一种读法,顾名思义,认为柏拉图的写作服务于一个整体的计划。与之相对,第二种读法认为对话创作顺序同时也体现了柏拉图思想的发展。而第三种读法则既否定柏拉图有固定的写作计划,也反对柏拉图的作品足以体现其思想的发展。先刚重点讨论了前两者。这一选择是明智的,因为两者及其不同的变体仍旧统治着当代的柏拉图研究。在对发展说的解释中,先刚结合了对于文风分析的讨论,展示了发展说与文风分析之间的互动。在另一方面,作为整体说的支持者,先刚批评了发展论诸种薄弱的理论预设,特别是这种理论默认柏拉图总是写出他所知道的一切知识。与之相对,先刚提出了一个强的整体论读法。^① 尤其独特的是,他认为柏拉图从40岁以后,也即学园成立后才开始写作。利用这一论述,他试图将所谓的“早期对话”与“不成熟”的特质隔离,从而加强整体论的柏拉图阅读进路的合理性。

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尽管今天少有学者持这样的意见,但它却与尼采在巴塞尔柏拉图讲义中反复强调的观点一致。^② 而与

① 这里不仅相对于 Kahn 的弱的整体论读法,也相对于图宾根学派内部的主流看法,他们一般认为本原学说尽管可能更早,但至少《政制》时期已经形成。

② 关于尼采的讲义的具体讨论,参见我的论文《尼采的柏拉图》,载于《中国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第三十四辑,第45-96页。

之相对,根据当代研究界的主流意见,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写作生涯,一些学者,特别是几位19世纪著名的柏拉图研究者甚至试图论证少量对话在苏格拉底去世之前已经写就。^①这里我并不完全同意先刚和尼采的意见,即将所有对话的写作年代定在学园成立之后。但就学园对于多数对话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言,笔者也不想掩饰对于他们立场宏观上的同情。然而首先值得说明的是,关于柏拉图写作生涯开端的讨论,正反双方实际上都无法拿出过硬的证据。换句话说,与作品的相对订年(relative chronology)相比,我们关于柏拉图作品的绝对订年(absolute chronology)其实所知甚少。多数古代的证言完全不可信赖^②,而除了少量对于历史时间的影射之外,所有的想法仅仅建立在对于作品各方面性质综合的或然性考量之中。这里,我当然不可能深入这个问题,但试图利用这个机会补充一些意见,通过复杂化相关的历史情境以使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与不少学者一样,先刚对于柏拉图作品订年的讨论注意到了希腊以口传作为特征的文化语境,但是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写作与出版概念自身的复杂性。假设我们认为《申辩》是柏拉图的第一部作品,这是说柏拉图第一部出版作品,还是说柏拉图第一部写成的作品,还是说柏拉图第一部开始写的作品?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到柏拉图可能同时写作几部作品,并且要考虑到这些作品,尤其是

① 我们并不知道柏拉图何时开始写作,Guthrie(1975: pp.54-56)讨论了柏拉图是否可能在苏格拉底死前开始写作双方面的证据,但他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柏拉图甚至更晚开始写作的可能。Heitsch(2002, 2004)在近期的一系列文章试图重新复活这一观念,认为柏拉图的 *Ion* 和 *Hippias Minor* 是苏格拉底生前所作(蒋如俊提醒我 Heitsch 的这一研究)。

② 比如 Diogenes Laertius 认为将 *Phaedrus* 视为柏拉图早年的第一部作品(3.38)。

长篇作品,可能经过了漫长的修订过程。^①其次,与创作过程相系,由于古代并没有正式的出版机构,在什么意义上—部作品算是出版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悲剧的出版或许是它的第一次上演;而一些演讲辞的出版至少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实际情境中在法庭或公民大会被演述,一个则是演说家经过修订原稿后以书面形式再发表,二者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那么我们如何在历史的语境下评估柏拉图的对话录?或许(1)他一开始只是在朋友间通过会饮或其他私人聚会的方式“朗诵”他的作品^②; (2)或许在演述后不久——但可能经过很长时间——朗诵过的初稿经过修订被一些朋友传抄,仅仅在小圈子流传; (3)最后,这部作品又以某种方式流通到市面,成为公众的阅读对象。首先,我们不知道对话录的发表是否经过这些步骤。即使柏拉图对话的出版经过了上述全部三个步骤,也并不好确认到底是(1)、(2)还是(3),甚至其他选项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的“出版”。设想一个更复杂的情景:假设柏拉图自己朗诵了,甚至跟朋友表演了一个苏格拉底与特拉叙马库斯(Trachymachos)等人关于正义的论战。然而后来,流通在市面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政制》(*Politeia*)。但我们可以问,是什么时候他开始“写作”或者“出版”他的《政制》的呢?而如果我们相信阿里斯托芬的《公民大会妇女》(*Ecclesiazusae*,前391年上演)暗示了一个原初版本的《政制》(*Urpoliteia*)的存在的话,那么这里的订年问题就更为复杂了。^③

① 关于柏拉图修订 *Politeia* 开端的传说,参 Halicarnassus 的 Dionysios 的 *De Compositione Verborum* 25. 207-218。

② 虽然可能,但并没有坚实的历史证据证明柏拉图在会饮或学园中演述其对话录。Ryle (1966) 认可这一选项,并且认为柏拉图总是本人扮演苏格拉底或其他对话引导者。

③ 所谓 *Urpoliteia* 指包含第2与3卷和第5卷开端的作品。支持这一观点早期有德国学者 Hermann 等,新近对之比较全面的论证以及研究综述,参见 Thesleff (2009), pp. 519-539。

当先刚说,柏拉图在学园之后才“开始著书立说”(我的强调),他的断言的证据可能来自所谓早期对话中对于中晚期学说的暗示。但即使我们认可对于对话录的这种理解,这个推论也似乎过强了。而结合刚才讨论的历史背景,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更为谦逊的假说,即柏拉图或许在学园成立之前就开始写作,特别是他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作为一个象征,较早时应该已经在苏格拉底后学中流传。但是很可能是学园的成立,才促使他修订并且向一个更为广泛的公众群体发表他的多部对话作品。这一假说可以比较好地协调所谓中早期文本中的劝勉元素(*protreptikos*)。图宾根学派的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告诉我们中早期对话录中的“劝勉”发挥了“广告”功能,从而吸引学生就学。而如果脱离了“学园体制”作为背景,这一元素的频繁出现是难以理解的。^①

需要承认,先刚关于柏拉图订年的论述是简化的且容易引发争议,尤其是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说明,为何柏拉图所有对话订年在柏拉图40岁之后。但是对于受到发展史论述过强影响的汉语学界而言,这一论述可以看作一个有益的反动,至少它有利于学界反思各种阅读柏拉图的不同策略,而不是过快地拥抱任何一种独断论的叙述。尽管先刚没有讨论弗拉斯托斯(Vlastos)这一战后发展论最具代表性的捍卫者^②,他对于发展论的宏观批评有很多仍是值得严肃对待的。我的异议主要在于他对“发展论”和“文风分析”^③二者关系的理解。当然众所周知,风格分析的出现晚于“发

① 先刚在第5章提及了对话录的“劝勉”色彩,但是没有强调这一元素与学园作为 institution 之间的关联。

② 其总结性的作品参见 Vlastos (1991)。

③ 这一方法起源于19世纪 Campbell, Dittenberger 与 Ritte 等人的研究,新近则包括 Brandwood 和 Ledger 等人,一个比较好的讨论参 Young (1994)。

展论”的柏拉图读法,并且风格分析的结果是有利于这一读法的。然而,我的疑虑在于先刚显得过强地建立了这一方法与“发展论”的关联。尤其介绍风格分析的结尾,他指出

斯达尔鲍姆提出的“思想发展说”是文体风格分析和统计方法的最大受惠者。后来的德国学者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弗里德兰德(Paul Friedländer)、耶格尔(Werner Jaeger)不仅用这个方法来阐释柏拉图,甚至把它运用到亚里士多德研究上面。

他的这一表述可能会如下误解:(1)维拉莫维茨等人对于柏拉图发展论的解释建立在文体风格分析的基础上;(2)亚里士多德的发展论解释利用了同样的方法,并且这一方法是从柏拉图研究中借来的。然而这两个论题并不准确。首先,文体风格分析方法的确实有利于“发展说”的理论,但是二者却不是在学习理上绑定的,我可以认可前者,而否定后者;^①也可以否认前者,而同情后者。其次,文风分析的结论与标准的发展说并不完全一致,比如一些根据文风被放入早期作品的对话录(比如《美诺》《克拉底鲁》等)常常被很多研究者视为中期或转型期对话。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发展说”往往在文风分析之外,还使用史源考证(Quellenforschung)、论证重构、主题研究(Motivforschung)等多种方法。其支持者甚至更多地依赖于风格之外的证据,特别是文本的内容(是否拥有理念论)、文学形式(比如以戏剧为主导或者以演讲为主导等)和间接记载等(比如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与克拉底鲁(Kratylos)的知名论述(*Met.* 987a32-b1);或亚里士多德区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① 参见 Kahn (2003)。作者是一位温和的统一论者,但同时也是文风分析的捍卫者。

的苏格拉底)。其四,事实上,维拉莫维茨等人对于柏拉图的发展史的论述,正如传统的古典语文学研究对于希罗多德或者修昔底德作品层次和成书的追问,主要依赖于文本和历史考证。而文体风格往往作为辅助性的证据,它既不是唯一,也不是决定性的证据。其五,耶格尔(Jaeger)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同样并没有主要依赖文体风格的考辨,更不是从柏拉图研究中借来的方法。^①

三

本书的第2-5章可以视为作者解读柏拉图的文献学^②和解释学原则的展开。其主要面对的解释学难题是,如果柏拉图对于书写的批判是彻底的,为什么他仍旧决定进行书写,并且以对话录来写作。这里,作者似乎力图找到一条介于施莱尔玛赫主义和主流分析哲学研究(作者称之为“义理派”)之间的中间道路。他承认

-
- ① 这一部分文本还有一些细节的失误。比如将色诺芬(Xenophon)、伊索克拉底称为柏拉图的师兄。然而事实上前者与苏格拉底的交往颇为可疑,其苏格拉底作品一般认为依赖于其他苏格拉底对话录作者,尤其是柏拉图。而伊索克拉底一般被视为高尔吉亚的弟子,与苏格拉底并无师承。再者,作者认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流传下来的柏拉图著作的真实性都是深信不疑的”,直到近代,由于历史考据方法的影响,流传在柏拉图名下的作品才受到怀疑。但事实上,古代不仅已经明确 *Epinomis* 出自柏拉图的学生菲利普(Philip of Opus),更重要的是,部分归于柏拉图的作品当时已经明确被视为伪作,比如《西西弗斯》(*Sisyphos*)和《论德性》(*De virtute*)等。此外,书中还有少量的拼写错误,比如将萨提尔戏拼写为 *Chytrous* (正确的写法当为 *Satyrikon* 或 *Satyroi*)。
- ② 作者详细介绍了 Gaiser 在《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中的所附的《柏拉图学述》(*Testimonia Platonica*),并且提及了 Gaiser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启动的《柏拉图文献补遗》(*Supplementum Platonicum*)项目。这一计划共包含九大卷,处理柏拉图和学园相关的间接文献,和由 Gaiser 整理和注释的《斐罗德姆的学园记述》(*Philodems Academica*)。然而值得补充的是,据笔者所知,在 Gaiser 去世之后,由于经费问题这一计划目前已经搁置,并且迄今 Szlezák 讲席的接替人也并无重启这一计划的表示。而 Philodem 的 *Academica* 的标准文本,如今可以参看 Dorandi: *Filodemo: Storia dei filosofi: Collezione di testi ercolanesi*, Napoli: Bibliopolis, 1991。

前者对话录“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原则,但反对形式对于内容的压倒;他赞许后者以柏拉图的义理或者说哲学为主要关注对象,而没有陷入到文学分析的游戏之中。正如赫斯勒(Vittorio Hösle)的进路^①,作者对图宾根学派与施莱尔玛赫(Schleiermacher)的调和在于他首先承认柏拉图不是为个别人,而是为所有人写作,尽管不同的对话针对不同读者。其次,作者也承认就对话录相比于论文更好地模仿了口头对话而言,这一文体在柏拉图那里具有某种优先性。作者主要反对夸大对话录的独特性以至于其足以超越柏拉图本人的书写批判。因为一方面,先刚强调,书写对话录并非柏拉图的独创,他的前人与后人,如亚里士多德,都进行这一文体的写作;另一方面,按照作者的看法,对话录由于谈话伙伴学力和柏拉图戏剧意图的限制,也没有记载理想的对话。他进一步推想,如果对话录实录学园辩论的实况,那么其价值会高于柏拉图虚构的内容(页69)。这种对于对话录书写的限制让作者看到了图宾根学派与主流分析哲学研究结合的希望^②,至少他表示二者应该结合起来以反对从“文学性”出发而引发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柏拉图解释(页158)。^③

下面,我将简略讨论作者的几个具体论述。其一关系到作者的苏格拉底论述与作者支持立场的张力。具体而言,作者认为苏格拉底不加选择地与任何人进行辩证交谈导致其遭到政治迫害。而柏拉图吸取了苏格拉底的教训,从精英主义立场出发,不再随意

① 参见 Hösle (2004)。

② 尽管这里表达对于主流分析哲学界的同情,但是在后文中似乎更多批判的意味。

③ 笔者同情作者的宏观立场,但是略微怀疑这里的表述。因为怀疑主义的柏拉图解读并不是与文学的柏拉图解读相互绑定,另一方面也不是与主流分析哲学就截然二分。从第一方面看,例如作者所批评的施特劳斯派并不是“怀疑主义者”,而是极端的“本质主义者”。另一方面,怀疑主义的柏拉图解读在主流分析哲学内部并不罕见,比如新近的一本专著 Vogt (2012)。

地传播自身的学说。如其文本所言:

柏拉图的哲学拒绝群众参与,自然也不会把他最重要的学说书写下来拿给群众褻读(更何况在一个连言论都要获罪的时代与社会,书写著作这样的“铁证”自然更为危险),而是只有少数学生才能够聆听它们。(《本原》页 68)

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在实践上的巨大差别在于,苏格拉底整日在大街小巷中逡巡,随便拉上一个人就可以进行辩证交谈,而柏拉图却明确地宣布:“我从来不和普通民众进行辩证法的交谈。(Gorg. 474a-b)(《本原》页 66)

我们至少有如下六个理由对于这一解释表示忧虑。(1)既然作者支持未成文学说等于本原学说的说法,因为这一学说本质上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论述,并且普通人难以理解,那么其传播在什么意义上会导致因言获罪并不清晰。尤其是根据古代的记载,柏拉图做过本原学说的公开演讲(即《论善》,参 Aristoxenus, *Elementa Harmonica* II 30-31),他并没有激怒听众,而是大部分听众对其内容表示不解和失望。(2)柏拉图在书写著作中多次表达的对民主制和民众的批评似乎比他的本原学说更可能引发“因言获罪”。如果说柏拉图出于逃避迫害的动机在书写中有所保留,那么他为何单单保留本原学说似乎是难以理解的。(3)作者在讨论书写批判的动机时,提及柏拉图时代,“绝大多数希腊人都是文盲,或至多只能识别少数文字,读懂一些简单的信息”,而“要想让思想产生影响,言谈是比书写有效得多的一种方式”(页 60)。按照这一说法,柏拉图选择口传又似乎为了更有效地传播思想。这一看法与作者认为柏拉图出于“精英主义”立场而保留书写相互矛盾,也与

作者认为柏拉图将关键学说托付口传,而仅仅选择性地书写以逃避迫害的说法相互矛盾。(4)正如图宾根学派对柏拉图的内传主义与毕达哥拉斯派的守密学说(Geheimhaltung)的区分,柏拉图对于书写的保留出于知识与获知的本性,而非后者一般出于外部或内部的权力运作的考虑。这导致如果作者支持前者(参页157)^①,则不应该支持后者。(5)作者明确对施特劳斯派的柏拉图解读持批评态度(参页154-155),但作者勾勒的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的教训与施特劳斯派对于隐微书写(esotericism)与政治迫害的揭示本质相差无几。(6)第二段引文中归于柏拉图的断言(即Gorg. 474a-b)实则出自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既然作者在全书中多次明确区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而此处在没有讨论如何在对话录,尤其是所谓的早期对话中区分历史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前提下,又直接将苏格拉底的陈述称为柏拉图的宣言,可能略显仓促。^②

我的第二个忧虑涉及到历史、对话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让我先总结一下先刚的立场,首先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的记载在历史学的意义上是可靠,正如他所言:

[T1] 就思想表达而言,柏拉图的文字是(故意)不完整的,而亚里士多德的文字是完整的,后者站在“旁观者清”的

① 在第5章,作者强调了“柏拉图的口传学说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那种‘秘传学说’(Geheimlehre)的根本差异”。

② 此外值得一提,本文的原文为τοῖς δὲ πολλοῖς οὐδὲ διαλέγομα,或许翻译为“我不与多数人进行交谈”,或者“我不与多数人进行辩证交谈”更为合宜。先刚的译法“进行辩证法的交谈”容易让人误解为交谈的对象是辩证法,何况这里柏拉图未必使用了διαλέγομα的特殊用法,即指向辩证谈话,而仅仅在非术语的意义上使用。此外,文本的语境是苏格拉底试图说服波鲁斯(Polos)与他一对一,以事实为导向进行讨论,而不要牵扯其他人和其他标准。因此这里的τοῖς πολλοῖς可能视为多数人,而非人民大众。

立场,以一种简单朴素的做法把他的老师的学说记录下来,知道什么就记下什么,想起什么就记下什么,就像他对于历史上其他哲学家的思想的记载一样。(《本原》第3章,页91)

其次,他认为柏拉图的对话扭曲了真实的学院对话,因为学园的学生,尤其是高阶的研究者,不会是英文中所谓的 *yes man*:

[T2] 试问,柏拉图的学生们(斯波斯普、塞诺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在和柏拉图进行真正的辩证交谈的时候,会笨到像对话录中的那些傀儡一样,被一路牵着鼻子走,不住地说“完全正确”、“正是这样”、“我完全同意”之类?!(《本原》第2章,页69)

最后,他认为:鉴于对话录的这种扭曲,如果柏拉图记载了他与高阶学生之间的真实交谈内容,那么其价值自然高于目前对话录中所记录的哲学讨论和学说。

[T3] 夸张点说(当然也只是夸张地说),假若柏拉图真的打算在书写著作中完全传达他的根本学说,那么只需记录下他和学生(比如亚里士多德)的真实的交谈的内容,其价值恐怕都要超过现存全部对话录的总和(页69)。

就[T1]而言,作者将亚里士多德看作一个历史学家,严格来说,甚至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就像波菲利(Porphyrios)笔下的亚美利(Amelios),一个朴素的记录者(参《普罗丁传》, *Vita Plotini*)。但这个形象是误导性的。尽管在亚里士多德,或者早期漫步派那里,“历史”的地位何在,他们的学述记录是否服务于历史兴趣等问题

可谓迄今依然争议重重^①。但可以确认的是,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还是泰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的记载都并不“简单朴素”。^②换句话说,他们的记载,从意图上说,主要服务于自己的哲学目的;从方法上说,则所有材料都或多或少通过漫步派的辩证法有所整合和增删。漫步派对于早期希腊思想的分类整理决定性地影响了我们当代对于早期希腊思想的把握,这一点已经有曼斯菲尔德(Mansfeld)和卢尼亚(Runia)等引导的研究在近年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重视。^③先刚似乎由于忧虑切尔尼斯(Cherniss)等学者对于亚里士多德记载的过度不信任态度,从而转而拥抱一个对立立场。然而很清楚,这里并不存在两个非此即彼的极端选项。我们根本不必或者完全信任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或者完全将其抛弃。换句话说,即使对于亚里士多德记载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也有必要批判性地对待他的论述,并且综合判断其历史价值。

关于[T2],即对话录中的“yes man”的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评估。第一,“yes man”并非柏拉图对话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谈话伙伴不仅常常对于谈话引导者的立场表示质疑,而且也会表示有限度或疑虑的肯定。因此不应该一概而论地将谈话伙伴视为“傀儡”。第二,在中早期对话中散落的对于交谈方法的讨论中,苏格拉底都更倾向于温和的追随者,而非自主的批评者。当谈话伙伴更具有批判精神时,苏格拉底往往使用 *elenchos* 的方法,而谈话往往以 *aporia* 终结,这也是所谓早期对话的典型特征;而当谈话伙伴或多或少地更接近于“yes man”的角色时,*elenchos* 则极少出现,同时谈话的过程与结果多为建构的,而非解构的。《政制》的

① 参见 Mansfeld & Runia (1997, 2009, 2010)。对二者观点的质疑,参 Zhmud (2001), pp. 219-243。

② 关于泰奥弗拉斯特的“历史”方法,参 Baltussen (2000)。

③ 特别参见 Mansfeld & Runia (1997, 2009, 2010)。

卷一和余下各卷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这一转化。当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兄弟从智者特拉叙马库斯(Trachymachos)接过谈话后,柏拉图的积极学说才得以展现。因此并不奇怪,“yes man”的现象在中晚期作品中远比在早期作品中显著,比如《巴门尼德》一文可谓代表。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柏拉图在晚期对话比早期对话展示了更为精深或者至少更为繁复的哲学。换句话说,与直觉相反,似乎谈话伙伴越不自主,对话录反倒更容易进入哲学的困难或核心议题。甚至在《蒂迈欧》的主体部分中,柏拉图直接去掉了谈话伙伴,而选取独白的方式。或许不是偶然,正如柏拉图通过演讲来说明善作为一的原则,而苏格拉底仅仅在对话中以比喻的方式谈论善的子女。如果我们用一个更为直白的道理来看这一现象,那就是谈话伙伴越顺从,反倒越有利于谈话引导者正面地展开他的学说。第三,与我们对于[T1]的评论相关,正如作者没有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在重构柏拉图的学说中所发挥的功用,他也没有足够严肃地评估学园的辩证法及其在柏拉图那里的反映。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论题篇》,尤其是卷八中,记载了学园辩证谈话的种种规则。这些规则规定了对话引导者和对话伙伴应该怎样寻找辩证话题,并且怎样发问,怎样回答。这里我们无法进入探讨这些规则的细节^①。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确认,在一个辩证谈话中,提问者应该以一般疑问句的方式构造问题,而回答者需要以 yes 或 no 的方式对应这一问题。双方只有达成一致才能继续前行,而不一致或者意味着一方的失败,或者意味着双方需要回溯到其他论题重新开始。无疑,柏拉图的对话在很多层面上反映了这一规则。谈话伙伴有时被“牵着鼻子走”并非仅仅因为他们的无能,而

^① 关于柏拉图的对话规则,特别是论辩双方“达成一致”(Homologie)在对话中的作用,参 Geiger (2006)。

有时是由于柏拉图的宣教意图,有时则是论辩规则使然。

[T3]是一个有趣也大胆的假说。如果我们想检验其是否有理,其实完全不用进行任何“思想实验”,而只需要以亚里士多德的部分文本和柏拉图的对话录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到答案,因为前者的文本中就包含或折射了部分学园内部的讨论。比如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EN. X)中他记载了自己与欧多克索斯(Eudoxus)和斯彪西普斯(Speusippus)对于愉悦的争论,在《形而上学》的M、N两卷中则有他和斯彪西普斯及色诺克拉底(Xenokrates)关于数的争论。没有人否认这些讨论的巨大价值。但如果我们相信[T3],我们可能会说,这些段落中所表达的哲学的价值超过柏拉图对话录的总和。或许一个漫步派的哲学家会这样看,但一定并非出自和先刚同样的理由。但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家,还是当代的亚里士多德或者柏拉图学者估计都很难认同这一过于推崇亚里士多德讲稿,而贬低柏拉图出版著作的判断。不是因为他们迷信对话,而是,例如,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标准来让人信服亚里士多德和斯彪西普斯关于愉悦的论战一定比《菲勒布》(Philebus)中苏格拉底和普罗塔尔库斯(Protarchus)的更精彩。

四

第6-11章是《本原》一书尝试结合未成文学和对话录重述柏拉图哲学的部分。先刚以柏拉图“哲学”概念^①开始自己的论述。他在开篇概述了 *philosophia* 作为柏拉图的术语和其他类似概念的

① 关于柏拉图的“哲学”概念,新近有两本德文专著值得关注,分别为 Schur (2013); Schwartz (2013)。

区别(比如 *historia*, *sophia* 等)^①,尤其是与智者的智慧概念的区别。他正确地强调了这个概念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与柏拉图本人的哲学深刻地绑定在一起。与上述历史探究相对,本章一个更为重要的工作,对于先刚而言,是将柏拉图的 *philo-sophia* 与浪漫派的 *philo-sophia* 概念相互区别。如他指出,后者的无限主义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的柏拉图解读,以至于与智者的智慧相对,柏拉图的哲学乃是一种无法达到目的的悲剧性追求似乎成为共识。追随克雷默(Krämer)的研究,先刚回溯了无限主义在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派那里的起源;接续阿尔伯特(Karl Albert)的研究^②,先刚展示哲学更应该理解为“智慧之友”,而非“对于智慧无法得到的追寻”;哲学家乃是有识者,而非无知者。

在对于柏拉图的哲学概念进行宏观勾勒之后,作者开始展示柏拉图哲学的上升之路。在第7章,他将研究聚焦于理念论。尽管先刚并不认可柏拉图对话录展示了柏拉图的哲学发展,但是他在这里试图展现一个理念论从无到有的历史发现。他将这一发现与《斐多》中苏格拉底著名的“第二远航”联系起来。显然,他并不认为这一“传记”记载了苏格拉底的“心路历程”。相反,他认为这是柏拉图的夫子自道。根据这一解读,“第二远航”一方面是柏拉图对于经验论和相对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开辟了走向本原学说的道路。当然将第二远航与“理念”(*eidōs* 或 *idea*)的发现联系起来是毫无争议的,但另一方面将视为对于“经验论和相对主义”的批评,甚至认为其已经走向或暗示“本原学说”则显然会引发争论。

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当然不可能对于先刚的论述展开具体

① 关于 *sophia* 一词的起源,特别参见 Burkert (1960) 以及一个争锋相对的论述 Riedweg (2004)。早期希腊的诸中“知识”概念的概念史研究,参见 Snell (1924)。

② 见 Albert (1989)。

的讨论。笔者不得不满足于两个评注：

首先，与雷亚利(G. Reale)一致，先刚坚持将 Δεύτερος Πλοῦς 解释为“第二次的航行”，而非希腊俗语中“第二好的航行”，因为他将“第一次航行”视为物理学的与物质主义的，而相应将“第二次航行”视为“后物理学的”、“形而上学的”。如果他坚持这一解读，那么他应该统一《政治家》与《法》中的解释。然而在对于后两篇对话的解释中，他又将 Δεύτερος Πλοῦς 称为“次佳方案”，^①这似乎暗示柏拉图对这一术语的使用相当不一致。其次，苏格拉底这里所反对的观点，简而言之，是将各种物质视为万物运动的“原因”或者说“根据”。他批评多数自然哲学家不知道其他类型的因果解释，而批评阿纳克萨哥拉(Anaxagoras)似乎引入了目的因，但却完全没有运用^②。那么显而易见，这里所批评的是物质主义的一个特殊面相，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物质的还原主义，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经验主义”或者“相对主义”，也不是“物质主义”的经验主义或者相对主义面相。

当然潜藏在这一琐碎问题背后的是一个更深的困难，这里既涉及先刚对于柏拉图的历史定位，也涉及到一个由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挑起，而由伯恩耶特(M. Burnyeat)发展的有关希腊

-
- ① 参《本原》(页411)：只有当哲学王或“具有真知的国王”暂时不在位的时候，法律的重要性和意义才凸显出来。因此相比于哲学王的“人治”，目前的“法治”终究只能算是一个“次佳方案”(δεύτερος πλοῦς, *Polii.* 300c; τὸ δεύτερον, *Leg.* 875d)。”
- ② 《本原》一书将苏格拉底对阿纳克萨哥拉的不满解读为：“理性(νοῦς)本身是个好答案，但单一的理性不足以解释千差万别的事物”(第7章，页237)。这似乎是不准确的，因为苏格拉底对阿纳克萨哥拉的批评之要义并不在于 nous 的能力不足，而是阿纳克萨哥拉不仅没有真正地运用 nous，而且从后门又偷偷引入了各种质料作为运动或行为的根据(αἰτία)。在《法》中，雅典人将无神论定义为不认为世界由神或者 nous 统治(参 *Leg.* 899c)。

哲学特性的宏观论题。^① 简而言之,先刚始终将柏拉图视为一个坚定的唯心主义者(Idealist),而将他的对手,特别是多数自然哲学家与智者视为怀疑论者、相对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与不可知论者等。这一定位值得引发讨论不仅在于怀疑论、相对主义、经验主义与不可知论并非可以互相替换的同义词,也不仅在于经验主义甚至是一个当时并不存在的概念,而且在于不少研究者认为希腊哲学——就其整体而言——缺乏一个健全的唯心主义的概念。换句话说,根据威廉斯和伯恩耶特,早期希腊哲学一直到晚期的怀疑论者,所有希腊哲学家,无论是早期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还是晚期塞克斯都(Sextus),都没有关于外部世界实存的焦虑。伯恩耶特因此将实在论视为希腊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其知识论的后果就是希腊哲学中缺乏主观性的真理概念。这一论述得到了英语世界大量学者的认同(尽管有所修订)^②,但同时也自然让所有熟悉德国哲学的人感到困惑,因为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叔本华都在某种意义上将柏拉图等人视为自身唯心主义的先驱。黑格尔专家哈弗瓦森(J. Halfwassen)甚至宣称他不知道伯恩耶特对哲学史有多么无知才会做出这样荒谬的全称判断。^③ 那么我们面临一个窘境,似乎或者知名的哲学史家伯恩耶特根本性地误会了整个希腊传统,或者德国的哲学家们误解了古代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哲学。

尽管这里涉及的问题远比上文所勾勒的情景复杂,但是即使

① Williams 的文章“The Legacy of Greek Philosophy”发表在 *The Legacy of Greece: A New Appraisal*, ed. Fin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上海人民版中译《希腊的遗产》), Burnyeat 的讨论参“Idealism and greek philosophy: What Descartes saw and Berkeley missed,” *Philosophical Review* 91 (1), 1982, pp.3-40。

② 例如参 Everson (1991); Tsouna (1992); Hankinson (1995)。英语世界对于这一观点的有力批评主要来自 Fine (2003)。

③ 这是笔者在 2012 年 2 月在 Heiligkreuztal 的柏拉图《会饮》的研讨班上听到的。

在这一简化的视域下,考察《本原》一书对于柏拉图的定位也颇为有趣,特别考虑到作者将柏拉图的理念论(Ideenlehre)与德国唯心论建立了直接的思想史联系。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同时捍卫*ιδέα*的传统译法“理念”,而批评陈康等人建议的“相”或在英语世界流行的 Form。与之相系,作者反对将德文的 Idealismus 译为“观念论”,而捍卫传统译法“唯心论”。而这一争议的根源在于,正如作者指出,柏拉图的 *eidos* 或 *idea*,接近黑格尔的 Idee,而不同于经验论传统的 *idea*。^① 于是,英国传统的 idealism 与康德之后的 Idealismus 看似同源,但含义却差之千里。而回到我们之前勾勒的背景,当 Burnyeat 认为希腊没有健全的唯心论时,正如他的论文标题所暗示的,他心中的主要对象无疑是贝克莱;^②而当《本原》一书坚持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时,作者心中的理想显然是经过先验唯心论洗礼之后的德国哲学家。这样一个术语使用的差异或许可以让我们协调之前提到的矛盾,而分别给予双方断言一定的认可。

然而,这里涉及的问题并不仅仅通过翻译术语语义的澄清就足以解决,因为我们并非首要关心概念的历史变迁,我们同时更希望搞清楚希腊哲人究竟事实上是如何认识自我与世界,他们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在什么意义上是连续的,在什么意义上是断裂的。一方面,有很强的声音宣称“实在论”与“唯心主义”的对峙是笛卡尔之后的故事,而希腊是一个异己的存在。而另一方面,也有声音告诉我们所谓的“意识”、“表征”、“意向性”等近代心灵的特征,

① 参见《本原》原文:“德语的‘Idee’就没有这么强烈的主观意味,它不但意指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性存在’,更重要的是指一种完全不依赖于感觉和经验的‘超越性存在’”(第7章,页243)。

② Burnyeat 没有引证德国唯心主义,只有一次正面引用了黑格尔的笛卡尔解读,但并不具有系统性,参见 Burnyeat (1982), p.38。

无一不能在希腊哲学中寻得。^①《本原》一书大概属于强调连续性,而反对断裂说的阵营。而在这一阵营内部,作者显然必定会抗议威廉斯等人将柏拉图传统与实在论划上等号的观念。如果说作者的概念分析完成了论证的第一步,它的彻底澄清还需要对于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的“心灵哲学”有一个更为彻底的梳理。先刚可能没有注意的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于2009年他的教职论文《古代的怀疑论与唯心论》^②已经试图接续黑格尔的哲学史解读,反对伯恩耶特对于希腊哲学的宏观诊断。作为先刚某种意义上的同盟,加布里埃尔相信,在希腊哲学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对于外部世界实存的忧虑,并且希腊哲学内部的唯心论正是对于这一忧虑的有力回应。这里不拟介绍加布里埃尔的具体论述,有趣的是,加布里埃尔论述视域主要集中于后经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也就是斯多亚、怀疑论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对于加布里埃尔而言,怀疑论和唯心论对持的问题,似乎并不是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关切,而是寄生在斯多亚的心灵表征主义的模式中(mentaler Repräsentationalismus)^③。正是因为世界仅仅通过表象(Vorstellung)才进入到我们的心灵,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于世界的直接体认,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以及我们对之认识的可靠性才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这一哲学史的描述是正确的,加布里埃尔尽管肯定了希腊的唯心论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在他论述里是晚生的,或者说最多只是在巴门尼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拥有部分萌

① 关于“意识”,参见 Caston (2002) 的一个经典讨论。注释 2 提及了围绕意识问题争论的文献。关于“意向性”,参见 Caston (2008)。而对于“表征主义”,尽管大量学者怀疑经典时期有这样的思想模式,但仍旧将其运用在讨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哲学中。

② *Skeptizismus und Idealismus in der Antike*. Suhrkamp, Frankfurt a. M. 2009。

③ 这一立场也为 Schmitt 及其弟子所持。比较集中的论述可参其综述性专著 Schmitt (2008)。

芽。那么是否如先刚那样坚持,在柏拉图和巴门尼德那里已经拥有健全的严格的唯心论学说,这似乎仍旧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五

上文略有提及,相比于主流论述希腊哲学的专著,《本原》一书的特色还在于用了相当篇幅论述了德国唯心论与柏拉图本原学说的近似性,并且在文本多处做出区分和比较。鉴于这部分论述相对独立于柏拉图研究本身,但也构成了本书重要特色。笔者将这一部分独立出来,进行单独的论述。

既然先刚是谢林研究出身,那么他对谢林哲学与柏拉图本原学说之间亲缘性的关注并不让人惊讶。从谢林研究的角度出发,主流学界尽管对于“谢林与柏拉图”多有论述,但少有谈及谢林与柏拉图的本原学说。^① 尽管本书的论述尚缺乏系统性,但某种程度上填补了部分相关空白。而另一方面,与图宾根学派内部的论述相比,《本原》一书的谢林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1)尽管黑格尔明确拒绝柏拉图的内传学说,但图宾根学派对于本原学说的历史效应论述中尤其重视黑格尔哲学与这一学说的近似,特别是哈弗瓦森的研究试图系统地确立了黑格尔与柏拉图传统的深远联系。与之相对,他们对于康德、费希特、谢林等其他角色着墨甚少。(2)图宾根学派之父汉斯·克雷默(Hans Krämer)甚至将谢林放入浪漫派传统,认为施莱尔玛赫对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忽视和拒

^① 参 Asmuth (2006), pp. 47-124。本书在近百页对于谢林与柏拉图的论述中完全对于本原学说保持沉默,即使是谈论 *peras* 与 *apeiron* 的段落,他也仅仅满足于对柏拉图《菲勒布》的论述。而注意到本原学说对于谢林决定性影响的研究,主要参见 Franz (1996, 2012),但他的论述相对更集中于谢林的早期文本。

绝在两个方面受到谢林的影响:其一,因为同一哲学(Philosophie der Identität)而排斥二元论;其二,因为艺术与哲学一体的有机整体思想,重视对话录而排斥其他流传。^①在本书中,先刚没有与这一立场进行直接的论战,但我们可以期待,或许在后续更为系统的研究中,他不会忽视这些有趣的对立。

从方法论上看,《本原》对于德国唯心主义与柏拉图本原学说关系的讨论主要是一种平行研究。作者或许希望,但并没有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将这一相似性视为柏拉图本原学说直接的效应史。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二者学说的这种高度相似性既不应该理解为某种巧合,也不应该将其视为某种历史理性统御下目的论式的必然。相反,其中大部分都可以从理论的,当然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获得解释。这一点由于近年对于德意志唯心论史前史的研究,尤其是图宾根神学院教育史方面研究的推进,得到了更好的揭示^②。由于黑格尔、荷尔德林与柏拉图的关系相对而言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讨论^③,这里我将主要补充部分关于谢林的相关信息。通过这一论述,我试图为先刚的论述增加一个历史的和实证的维度。尤其值得商榷的是,他的一些表述似乎暗示谢林并没有对于柏拉图本原学说的明确知识,例如“虽然谢林自己并没有清楚意识到他现在的哲学已经与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接通,但他在事实上却是走上了后者的路线”(《本原》第4章,页133)。

首先,众所周知,在1790年代的图宾根,柏拉图和康德逐渐成为学者与学生关注的中心。黑格尔和荷尔德林组织了读书小组,主要阅读对象包括柏拉图、康德和雅可比,而柏拉图又是重中之重。几乎同时谢林也开始了对于柏拉图的独立阅读。但需要注意

① 参见 Krämer (1990), pp.19-26。

② 特别是 Franz (2004-2007)。

③ 特别是 Halfwassen (1999)。

的是,当时的柏拉图阅读习惯与我们今天并非完全一致。首先,尽管新兴的哲学史研究通常对所谓的普罗丁-普罗克洛(Plotinus-Proklos)系的新柏拉图主义持很强的怀疑态度,但柏拉图主义传统(包括所谓的中期柏拉图主义和文艺复兴柏拉图主义)与柏拉图之间的关系仍旧不若今天一般截然二分。如果说今天的柏拉图读者一般集中并且首要阅读柏拉图原文,与之相对,带有柏拉图主义烙印的古注传统仍旧在谢林时代的柏拉图阅读中发挥着极大的影响,比如普罗克洛(Proklos)或者斐奇诺(Ficino)的注解。^①其次,柏拉图的中晚期文本,尤其是其中的形而上学和宇宙论,在当时的教学与研究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早期文本和伦理学则相对受到漠视。无疑,谢林的柏拉图理解受到上述两个条件的限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这一历史条件也告诉我们二者接触并且重视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并不奇怪。笔者这里当然不拟对所有史源进行介绍^②,而仅举部分例证说明二者与本原学说的早期接触。

在谢林与荷尔德林的图宾根老师中,有一位名为菲德(Christoph Friedrich Pfeiderer)的欧几里德专家。^③这位学者从1782年到1821年一直在图宾根任教,主要负责物理和数学方面的课程。他不仅是一位数学上的保守主义者^④,而且更是一位欧几里德专

① 当代的柏拉图全集通常都是柏拉图的原文,而当时不少通行的柏拉图文本中往往附有柏拉图主义的注解,比如谢林与荷尔德林使用的双桥版附 Ficino 注。

② 谢林早年的柏拉图史源可以参 Franz (2004), pp. 601-614; 以及 Gloyna (2002), pp. 80-143。

③ 关于 Pfeiderer 的传记主要参 Ziche (1994), pp. 9-23。他的图宾根物理学课程已经由 Ziche 整理出版,参上书。由 Pfeiderer 命题的图宾根硕士数学试题库,同样由 Ziche 整理、翻译并附解读出版,参 Franz (2004-2007) 卷 2, pp. 316-366。

④ 他追随希腊的,特别是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哲学,反对新兴的“无限代数”。认为像“无限大”“无限小”(infinite magni et parvi)这样的概念都应该从数学中驱逐出去。这里主要参 Franz (2012), pp. 112-113; 更为详细的论述,参 Ziche (1994) 前揭。

家。菲德对谢林等人产生影响主要是由于他负责神学院所有硕士生毕业考中的数学考试。而迥异于当下的数学测验,这项考试的主要内容就出自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值得注意的是,考试的中心不仅仅是通过这一文本中的定理来解决具体的数学问题,而且包含大量历史文本校勘,以及数学基础相关问题(数学对象的本性、定义和公理的关系等)。换句话说,这门数学学科也同时为语文学、知识论和形而上学所充斥。于是不难理解,在菲德负责的考试中,不仅《几何原理》,而且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克洛(Proklos)的《几何原理注》等均成为当时图宾根硕士生的必读文献。普罗克洛的这一注本不仅是理解新柏拉图主义数学的重要文献,同时也记载了柏拉图主义的本原学说的部分内容,包括其在数学上的运用。他特别从这一学说出发解释了点、线、面、体等数学对象的本体论根源,甚至从“一”和“不定之二”的互动出发,解释不同“曲线”如何从代表“一”的圆和代表“二”的直线中构造而出。因此这部著作是“图宾根三杰”接触柏拉图所谓的本原学说最初的重要来源之一。

根据齐舍(Paul Ziche)研究,谢林在很多方面受到菲德及其所代表的古代数学的传统的影 响。不仅他早期作品就充斥着利用数学术语的类比^①,而且在1801年《对我的哲学体系的介绍》以及论文《论构造》(“Ueber die Konstruktion”)中将借自《几何原理》的定义、定理、公设和命题等构成的体系视为科学的基本特征^②。而更为有趣的是,早期谢林哲学的公设(Postulate)概念,正如他自己也强调的,更接近古代数学的理念,而完全不同于康德主义著名的实

① 比如 Strahlen, unendliche Sphäre, Unendlichkeit 等,具体的段落参 Ziche (2004), p. 616, 注释2。

② 参见 Ziche (2005), p. 385。

践理性的公设^①。因为尽管两者均将公设视为一种必然的要求,但是后者设定的是某种不可达成的理念(上帝或灵魂不朽),而前者设定的是完全可以在现实中实现的基本对象或者说现实的原初构造。^②因此一点儿也不意外,我们在谢林的藏书中可以看到图宾根 1820 年出版的非德的学生昊博(Hauber)^③的《几何英华》(*Chrestomathia Geometrica*)。这部作品立足于非德在图宾根的授课,包含欧几里德《原本》的原文,普罗克洛的注解、对于数学史和数学课程的反思等内容,并且附录包含非德的论文以及练习材料,对于谢林时期图宾根神学院的数学教学情况是重要的史料。^④

当然,相比于这些间接的关联,谢林早期对于柏拉图本原学说的利用尤其体现在他对《蒂迈欧》(*Timaeus*)的解读中,尤其他引入 *peras* 与 *apeiron* 来重构柏拉图的思想,并且将前者称为形式,后者视为质料。无疑,这都是在柏拉图文本,甚至在《菲勒布》(*Philebus*)中也无法找到的内容。而他在注解这一文本时反复参考的二手文献,特别是布鲁克(Brucker)和普莱辛(Plessing)记载了大量古代注解的相关内容,比如普罗克洛将 *apeiron* 与质料相提并论,他的这一接受显然受到这些注解传统的影响。比起上面的想法更让人费解的是,谢林在这一文本中还将 *peras* 称为量(Quantität),*apeiron* 称为成为质(Qualiät)。因为如果 *apeiron* 也被

① 谢林对于 Postulate 的理解参上引 Ziche (2004);关于谢林和黑格尔对于数学概念运用,特别是“无限性”、“绝对性”和“环节”(Moment)等最为系统的研究,参 Ziche (1996)。

② 比如欧几里德的公设:“两点之间可以连接一条直线”或“有限的直线可以被无限延长”等。

③ Hauber (1775-1851)曾在图宾根学习,后来也是古代数学文本的编订者,其涉及的文本包括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的《原理》以及 Proklos 的注解。黑格尔与谢林也都与其有私交。参 Ziche (1994), p. 17, 注释 28。

④ 参见 Müller-Bergen and Ziche (2007), 编号 950。

称为 *more or less*, 似乎是某种量, 而质则似乎代表了某种确定之物, 更接近 *peras*。但谢林的这一想法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 因为在本原学说内部, 不定之物也可以被“冷-热”、“较大-较小”等表达所指称, 它们似乎可以被视为某种不断变化的“质”。而另一方面, 确定之物的和谐与比例, 就其本质, 无非是数, 因此也被谢林称为“量”。由于这些思想与《蒂迈欧》的张力, 或许并不奇怪, 谢林在 1804 年之后甚至认为这一对话录为伪书, 而将柏拉图主义传统中的二元论视为真实的柏拉图学说 (*die wahre Lehre*), 强化了第二本原 (质料 = 非存在 = 恶) 在其哲学构造中的地位^①或许, 我们可以猜想,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所谓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拒绝也暗含了一个对于谢林的批评。

六

总体而言,《本原》一书是近年来在汉语学界值得重视的柏拉图研究。作为导读, 它的语言平实清晰, 并且在相对简短的篇幅内包含了丰富的内容, 涉及到柏拉图的生平、著作、解释史和哲学的方方面面。尤其难得的是, 相对于汉语学界接受的主流研究, 它复杂化了柏拉图阅读的解释学情境, 适当地强调了口传与书写的张力作为阅读柏拉图的重要背景。当然, 从导论的角度看, 他也并非没有弱点: 首先, 全书在历史叙述上仍旧不够精确, 这部分是因为作者对于不同的史料缺乏足够的批判, 部分是因为作者常常过于依赖柏拉图本人提供的历史叙述框架。其次, 尽管作者已经力图涵盖柏拉图哲学的整体, 但是显而易见, 这部作品基本错过了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和伦理学。鉴于二者对于理解柏拉图哲学的重要意

^① Asmuth (2006), pp.116-122.

义,以之为导论的初学者可能得到不太完整的柏拉图形象。

而从研究专著的角度来说,本书以图宾根学派的范式为出发点对柏拉图进行了独立研究,其在汉语学界的开创之功是毋庸置疑的。但另一方面,导读的设定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妨碍了本书作为专著的论述,使得作者在众多主题上未能深入,这尤其体现在作者的论述未能完全反映近年研究的推进。除此之外,这本书可能引发争议的论述并不少于图宾根学派的,尽管它们之间自然并不完全一致。正如之前所揭示的,首先,作者尽管有力地揭示了部分发展论的弱点,但他所支持的强统一论论述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其次,作者在解释学的讨论中,力图达成某种“文学分析”和“论证重构”的平衡,但这一方法的宣称似乎在后文的对话录讨论中被悬置,甚至被明确放弃。最后,作者的确展示了在对话录中我们可以找到本原学说的痕迹,但是似乎还没有充分清晰地展示,本原学说的引入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或许晦涩、或许本来被错误理解的段落。当然,毫无疑问,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作品对汉语研究界而言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刺激和挑战,我们也期待作者后续的作品能够更好地回应本文所提出的疑问。

参考文献

1. Albert, K.: *Über Platons Begriff der Philosophie*. Sankt Augustin: Academia Verl. Richarz, 1989.
2. Asmuth, C.: *Interpretation — Transformation: Das Platonbild bei Fichte, Schelling, Hegel, Schleiermacher und Schopenhauer und das Legitimationproblem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6.
3. Baltussen, H.: *Theophrastus against the Presocratics and Plato: Peripatetic dialectic in the De sensibus*, Leiden: Brill, 2000.
4. Burkert, W.: “Platon oder Pythagoras? Zum Ursprung des Wortes Philosoph-

- ie”, *Hermes*, 88., 1960, pp. 159–177.
5. Burnyeat, M. F.: “Idealism and Greek philosophy: What Descartes saw and Berkeley missed,” *Philosophical Review* 91 (1), 1982, pp.3–40.
 6. Caston, V.: “Aristotle on Consciousness”, *Mind*, 111 (444), 2002, pp. 751–815.
 7. —: “Intentionality in Ancient Philosophy”,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08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08/entries/intentionality-ancient/>>.
 8. Dorandi, T.: *Filodemo: Storia dei filosofi: Collezione di testi ercolanesi*, Napoli: Bibliopolis, 1991.
 9. Erler, M.: *Der Sinn der Aporien in den Dialogen Platons: Übungsstücke zur Anleitung im philosophischen Denken*, Berlin: W. de Gruyter, 1987.
 10. —: *Platon*, in: H. Flashar (Hg.),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egründet von Friedrich Ueberweg. Völlig neu bearbeitete Ausgabe. *Die Philosophie der Antike*, 2/2, Basel, 2007.
 11. Eucken, C.: *Isokrates: Seine Positionen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n zeitgenössischen Philosophen*, Berlin: W. de Gruyter, 1983.
 12. Everson, S.: “The Objective Appearance of Pyrrhonism”, in S. Everson ed.: *Psychology (Companions to Ancient Though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1–147.
 13. Fine, G.: “Subjectivity, Ancient and Modern: The Cyrenaics, Sextus, and Descartes,” in *Hellenistic and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eds. J. Miller and B. Inw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92–231.
 14. Franz, M.: *Schellings Tübinger Platon-Studi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6.
 15. —: “Patristische Philosophie in Tübingen um 1790. C.F. Rößler und seine Bewertung des Neuplatonismus”, in Rainer Adolphi/Jörg Jantzen (Hrsg.), *Das antike Denken in der Philosophie Schellings*, (Schellingiana; 11) Stuttgart-Bad Cannstadt 2004, S. 601–614.
 16. —: *Materialien zum bildungsgeschichtlichen Hintergrund von Hölderlin, Hegel und Schelling*, Eggingen: Edition Isele, 2004–2007.
 17. —: *Tübinger Platonismus: Die gemeinsamen philosophischen Anfangsgründe von Hölderlin, Schelling und Hegel*, Tübingen: Francke Verlag, 2012.
 18. Fritz, K.: *Platon in Sizilien und 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enherrschaft*, Berlin: De Gruyter, 1968.

19. Gabriel, M.: *Skeptizismus und Idealismus in der Antike*, Suhrkamp, Frankfurt a. M., 2009.
20. Geiger, R.: *Dialektische Tugenden: Untersuchungen zur Gesprächsform in den Platonischen Dialogen*, Paderborn: Mentis Verlag, 2006.
21. Gloyna, T.: *Kosmos und System: Schellings Weg in die Philosophie*,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2002.
22. Guthrie, W. K. C.: *Plato: The man and his dialogues: earlier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23. —: *The later Plato and the Acade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4. Hankinson, R. J.: *The Scep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25. Heitsch, E.: *Dialoge Platons vor 399 v. Ch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2.
26. —: *Platon, Apologie des Sokrates: 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4.
27. Hölsle, V.: *Platon interpretieren*,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4.
28. Kahn, C. H.: *Plato and the Socratic Dialogue: The philosophical use of a literary 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9. —: “On Platonic Chronology”, in J. Annas and C. Rowe,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ter 4.
30. Krämer, H. J.: *Plato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etaphysics: A work on the theory of the principles and unwritten doctrines of Plato with a collection of the fundamental document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31. Mansfeld, J., and Runia, D.T.: *Aëtiana: The Method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a Doxographer* (Volume I: *The Sources*, *Philosophia Antiqua* 73), Leiden: E. J. Brill, 1997.
32. —: *Aëtiana: The Method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a Doxographer* (Volume II: *The Compendium*, *Philosophia Antiqua* 114), Leiden: E. J. Brill, 2009.
33. —: *Aëtiana: The Method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a Doxographer* (Volume III: *Studies in the Doxographical Traditions of Greek Philosophy*, *Philosophia Antiqua* 118), Leiden: E.J. Brill, 2010.
34. Müller-Bergén, A.-L., and Ziche, P.: *Schellings Bibliothek: Das Verzeichnis von Schellings nachgelassener Bibliothek*,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

- Holzboog, 2007.
35. Riedweg, Ch.: “Zum Ursprung des Wortes ‘Philosophie’ oder Pythagoras von Samos als Wortschöpfer”, in A. Bierl, A. Schmitt, A. Willi (Hg.), *Antike Literatur in neuer Deutung, Festschrift für J. Latacz*, München: Saur, 2004, pp.147–181.
 36. Ryle, G.: *Plato's Progr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37. Schur, B. T.: “Von hier nach dort”: *Der Philosophiebegriff bei Platon*, Göttingen: V & R Unipress, 2013.
 38. Schwartz, M.: *Der philosophische bios bei Platon: Zur Einheit von philosophischem und gutem Leben*, Freiburg: Verlag Karl Alber, 2013.
 39. Schmitt, A.: *Die Moderne und Platon: Zwei Grundformen europäischer Rationalität*, Stuttgart: Metzler, 2008. (中译: [德]施米特:《现代与柏拉图》, 郑辟瑞、朱清华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年。)
 40. Snell, B.: *Die Ausdrücke für den Begriff des Wissens in der vor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sophia, gnōmē, synesis, historia, mathēma, epistēmē)*, Berlin: Weidmann, 1924.
 41. Szelezaák, T. A.: *Platon und die Schriftlichkeit der Philosophie*, Berlin: W. de Gruyter, 1985.
 42. Thesleff, H.: *Platonic Patterns: A collection of studies*. Las Vegas: Parmenides Pub., 2009.
 43. Tsouna, V.: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Cyrenaic Sch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44. Usener, S.: *Isokrates, Platon und ihr Publikum: Hörer und Leser von Literatur im 4. Jahrhundert v. Chr.* Tübingen: G. Narr Verlag, 1994.
 45. Vlastos, G.: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46. Vogt, K. M.: *Belief and truth: A skeptic reading of Plat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7. Wilms, H.: *Techne und Paideia bei Xenophon und Isokrates*, Stuttgart: B.G. Teubner, 1995.
 48. Williams, B.: “The Legacy of Greek Philosophy”, in *The Legacy of Greece: A New Appraisal*, ed. Fin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49. Young, Charles M.: “Plato and Computer Dating”,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1994, pp.227–250.
 50. Zhmud, L.: “Revising Doxography: Hermann Diels and his Critics”, *Philo-*

- logus, 2001: pp.219–243.
51. Ziche, P., and Pfeleiderer, C. F.: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Pfeleiderer: Physik: Naturlehre nach Klügel: Nachschrift einer Tübinger Vorlesung von 1804*,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1994.
 52. —: *Mathematische und naturwissenschaftliche Modelle in der Philosophie Schellings und Hegels*,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1996.
 53. —: “Systemkonzepte der antiken Mathematik bei Schelling. Zur Interpretation des Postulate-Begriffs in Schellings Frühphilosophie. ”, Jörg Jantzen (Hg.): *Das antike Denken in der Philosophie Schellings*, Stuttgart-Bad Cannstatt, 2004.
 54. —: “Mathematik und Physik als philologisch-geschichtliche Wissenschaften. Christoph Friedrich Pfeleiderers Inauguralthesen in den Fächern Mathematik und Physik (1790–1792)”, in Michael Franz, ed.: “... im Reiche des Wissens cavalierement”? Hölderlins, Hegels und Schellings Philosophiestudium an der Universität Tübingen, Tübingen: Hölderlin-Gesellschaft, 2005, pp. 372–404 (Schriften der Hölderlin-Gesellschaft. Vol. 23/2 = *Materialien zum bildungsgeschichtlichen Hintergrund von Hölderlin, Hegel und Schelling*. Vol. 2).